



2014

「影像纪实」

历史早已定格
定格的历史不容歪曲
更不能否定

中国最后的“慰安妇”

郭一江 摄

 文匯出版社

中国最后的“慰安妇”

郭一江 摄

 文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中国最后的“慰安妇” / 郭一江摄影.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496-2686-1

I . ①中… II . ①郭… III . ①军国主义—性犯罪—史料—日本—图集 IV . ①K313.4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66678 号

中国最后的“慰安妇”

摄 影 郭一江
责任编辑 甘 棠
装帧设计 王 茵

出版发行

 文汇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丽佳制版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开 本 787 × 1092 1/12
印 张 16
书 号 ISBN 978-7-5496-2686-1
定 价 58.00 元

前言

2014年4月18日，记者随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研究员陈丽菲教授夫妇，来到山西孟县一个偏僻的山村，向二战日军“慰安妇”性暴力受害者、第一批向日本政府提起索赔诉讼的最后一位老人——李秀梅大娘告别、送行。

送别李大娘后，“中国‘慰安妇’民间研究第一人”，当地退休小学教师张双兵又带着我们走访了山西两批向日本政府提起索赔诉讼在世的最后一位老人张先免，还有另一位住在太行山深处一小山村的受害老人曹黑毛。

5月下旬，又和本报年轻记者单颖文远赴广西、海南——走访了日军“慰安妇”性暴力受害的十一位幸存老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政府推行的“慰安妇”制度、以及日军在中国、朝鲜、韩国及其它亚洲各国强征“慰安妇”，犯下的性暴力罪行是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幕，在世界历史记忆遗产中是最沉重、最苦难的一页。然而，战争硝烟散去七十多年，日本安倍政府却始终不承认、不认罪、不道歉、更不赔偿。近年来，安倍右翼政府多次参拜放有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并一次又一次否认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这一倒行逆施受到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各国人民和其它世界各国主持主义的人民的谴责。

在这一悲剧中、直接受到日军性暴力摧残的众多受害者，七十多年前不仅遭受肉体的伤害，更在以后的漫漫人生中经受着噩梦般的心灵煎

熬，屈辱地生活在黑暗中。安倍政府和日本右翼的言行，一次又一次地伤害着她们。

走近她们，采访她们，我似乎还没做好精神准备。我想让自己更冷静些！客观地看看她们如今的生存状态，绝不触动深隐内心的伤疤。

在李秀梅大娘的遗像前，我静静地三鞠躬。而苏智良教授、陈丽菲教授和他们的一位年轻的研究生赵文杰，深深地跪在李大娘灵前，三叩首，将杯中的酒轻轻地洒在灵前，我深为感动。

在张先免、曹黑毛老人的破炕上，面对老人的哭诉，陈丽菲教授和老人相拥在一起，没有再多说一句话，久久地、静静地。似乎时间都凝固了。小小的窑洞里只听到微弱呼吸和抽泣的气息。苏教授夫妇和他们的学生从1992年起，开始在全国各地调查中国“慰安妇”历史问题，——走访受害老人，寻访残存的“慰安所”遗址，建立了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做口述历史，帮助老人到日本打官司，控诉日军暴行，接济劫后幸存，生活在困境中的老人们。他们和老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们遭受的苦难是难以想象的！这不仅是她们的个人的苦难，更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人类的悲剧。她们幸存下来极不易。还她们做人的尊严。她们值得我们敬重。”苏智良夫妇，20多年来，倾注了内心深深的情感。

在广西荔浦的一个小山村，何玉珍老人的床上，一只老母鸡竟然在

她身边床上的被子上生蛋、孵小鸡，而年老体弱的老人竟然无力、无法驱赶举手之劳就可逐走孵蛋的母鸡。也许，老人压根就不想驱赶这只也许是唯一陪伴在她身边的小生灵。初夏的阳光从挡着塑料薄膜的木窗中射来，照着老人滞木的眼。

另一位老人韦绍兰，和她陪伴终生的屈辱——一个日本兵生下的儿子生活在一起。她被日军掠去据点，遭受侮辱、强奸，怀孕后的人将被处死，而她逃出来了。正因为有这个乡间皆知日本兵儿子，后来的丈夫至死从未原谅过她，亲生的小儿子离家出走至今不知何处。这个日本兵儿子，从小受人另眼，至今未婚。她们母子在中日爱心人士帮助下曾去日本作证、控诉。“我要亲手杀了他！”应对记者“如何面对日本父亲”的提问，这个有着日本血缘的中国农民无比痛恨、愤怒至极地说。

在海南临高县南宝镇，88岁的林爱兰老人孤独一生、无一亲友依靠，住进了镇养老院。老人曾是一名抗日游击队女战士，受伤被俘后，被日军强奸，关进慰安所，遭受凌辱，因为逃跑被抓，大腿筋骨被日军打断，早已不能行走。没有轮椅，行走只能拖着椅子，走一步移一步。她指着头上的伤疤、手指含在嘴里，讲述着那惨痛的经历。记者看到她的床前放了一把铁铲，还有说她还藏了一把刀在床上——她只有这样才能驱除压在心中的恶魔，晚上才能入眠。

在陵水县本号镇医院，87岁的陈亚扁大娘躺在病床上，枯柴般的手臂扎着针。她正在输液，另一只手不停地揪着喉部，痛苦万状。年轻时，被日军抓进慰安所的悲惨经历深深地印在她那迟滞的眼神里。她也曾勇敢地站出来，到日本控告日本政府。她久久地拉着小单记者的手，一刻也不松开。“下次你们再来，就看不到我了！”她很绝望的眼神，睁得很大很大，放着无助的光芒，一会儿又黯淡下去了。官司输了，她心里不屈、不服！

在临高县一黎族小山村，符桂英老人昏暗的小屋，屋顶透着光，墙是土墙，窗户昏暗，拉下电灯长绳开关，却不见灯亮。电饭煲剩着小半锅米饭，另一小锅里剩着清汤煮熟的豇豆，没有丝毫油花。这是中午吃剩下的，晚上再接着吃。

……

老人们当下的生存状态着实令人震惊。然而，和老人接触中记者感受到老人内心深处的渴望：讨回公道！让人类的历史悲剧不得重演！

在离开陈亚扁老人病床，一位中年妇女找到记者，述说着她们那个山村，还有一位同样遭受过日军摧残的老人，从没人去关心过，生活很惨。由于早安排了采访行程，没时间前去核实采访，只好留下她的联系电话。

5月1日长假，苏智良、陈丽菲教授夫妇和在北大历史系读博士的儿子、还有他们的学生，再次前往山西。张双兵来电，太行山区内还有8位愿意站出来作证的受害老人，他们利用长假一同前往核实确认并抢救记录，作“口述历史”。

当记者正在广西、海南采访时，正好碰到来自四川成都的纪录影视制作人郭柯和他的团队。几年前他曾拍过广西荔浦韦绍兰老人纪实影视作品“三十二”。当时拍摄时，幸存受害者还有32人。几年过去了，如今幸存者仅剩下24人。抢救性拍摄幸存老人纪实片“工程”他正在筹划中，6月正式开机。如今，这部取名“二十二”片名的纪实片已经拍摄完成。在韩国、法国等电影节上获得好评。

“随着老人一个个去世，再不抢救性记录就来不及了！”苏智良教授夫妇、张双兵、郭柯等人都这么说。

他们和本报记者想到一块了！

2014年6月12日，联合国正式受理中国政府提交的“南京大屠杀”

和“慰安妇”历史档案——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申请。6月19日《文汇报》以4个版面的篇幅，刊发了我与年轻记者单颖文此次广西、海南采访这些受害老人的专访稿件——“中国境内最后24位‘慰安妇’调查”，引起极大反响。然而就在稿件刊发的第二天，海南就传来邓玉民大娘去世的消息。邓玉民是我们采访的海南“慰安妇”受害老人中唯一的苗族人。我们见到老人时，她以体弱多病的身躯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见到，为和病魔抗争，老人吃的竟是不到一元钱一包的白色药粉。老人说：“是‘赤脚医生’开的药。”虽然文革过去多年了，边远山村的老人还将乡村医生称作“赤脚医生”。墙上挂了一块县红十字会的匾牌，这表明老人是县医疗单位重点照顾对象。匾牌上积满了灰尘、烟垢。每年都有志愿者上门送老人到镇医院检查、看病。然而，平常真正生了病，还得靠村里的“赤脚医生”。老人床头还摆放着一些药品，据说是正在海南大学念书的一位叫“麻生”的日本小姑娘送来的。在海南走访10多位受害老人时，她们多说起麻生小姑娘常来看望的事。面对这一历史，对于日本人来说一样是沉重的！然而，还是有新一代自觉的承担、勇敢的面对。这的确令人欣喜。

我曾早在1995年和2002年两次采访“慰安妇”老人，一次是安徽的韩裔大娘李天英。采访次日，《人民日报》刊发了《“慰安妇”的控诉》特写新闻照片。如今她们都早已去世了。当时也是在苏智良教授的上海师范大学。那会儿“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还没正式成立。

这次广西、海南采访后，虽然报纸也刊发了全景式的报道，但我总感觉还有遗憾。还有山西的8位在世老人，黑龙江和湖北的两位老人还没有采访到。到了这年的9月、12月我又三次出发，终于采访到了目前国内二战日军“慰安妇”制度性暴力受害的全部24位幸存老人。拍摄了“2014，中国最后的‘慰安妇’”24位老人照片资料。幸存老人们

的历史影像定格在2014年。

如今到了整理资料，准备出版这本画册之时，各地又传来不幸的消息。海南的符桂英、广西的何玉珍、海南的林爱兰、山西的郭毛孩、张先免等老人又相继去世了。

2015年9月正值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暨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中国人民抗击侵略可歌可泣的民族精神。同时，不能忘记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给我们民族造成的苦难。10月上旬，联合国将正式宣布“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历史档案申遗的评审结果。为此，在上海市摄影家协会、上海新闻摄影学会的支持下，《文汇报》社、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决定在10月中、下旬举行“中国最后的‘慰安妇’摄影展”。然而，申遗结果令人遗憾。

“南京大屠杀历史档案”申遗成功，“‘慰安妇’历史档案”落选。面对这一结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0月12日表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咨询委员会正式回复我国政府：除中方外，还有其他国家也是“慰安妇”问题的受害国，根据世界记忆名录申报指南的有关规定，鼓励有关国家联合申报，并将于2017年举行的下届会议上对该项申报进行评审。中方将认真考虑教科文组织的建议。

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表示：这次“‘慰安妇’历史档案”遗憾落选，但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回复并没有否认二战时期日军“慰安妇”制度对中国和亚洲妇女残害的历史事实，以及对我们提供档案的质疑。而是鼓励我们和在这一历史事件中同样受到严重伤害的韩国等亚洲国家联合申办，下届再审。我们将和韩国学者联系，做好联合申报的前期准备工作。

同时《文汇报》社决定，虽然申遗落选，但展览仍然按原定计划举行。10月25日—11月5日、11月8日—11月22日，展览分别在上海报

业集团大厦和宝山区图书馆举行。正如摄影展览前言所述：

“…… 二战中，三千五百万同胞伤亡，南京大屠杀惨案 30 万同胞遇难，超过 20 万的中国妇女被掠为日军‘慰安妇’，遭受心灵和肉体的、灭绝人性的摧残。

70 年过去了，日本右翼势力、安倍政府至今还在歪曲甚至否认南京大屠杀和‘慰安妇’的历史。这当然遭到中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反对。

纪念抗战胜利是为了和平，不忘民族苦难是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2014 年，《文汇报》记者郭一江多次远赴山西、广西、海南、黑龙江、湖北等地，采访拍摄目前我国最后的 24 位‘慰安妇’受害幸存老人。到今年，又去世了 4 位老人。70 多年前，她们曾遭受巨大的屈辱和残害，1990 年代以来，陆续有 100 多位受害幸存老人勇敢地站出来，揭露日军的暴行，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如今她们都年事已高，在她们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进行着不停的抗争。她们值得我们同情，更值得我们尊敬！

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民族的苦难！记住这些苦命的老人。”

11 月 12 日，摄影展正在宝山图书馆展出期间，山西又传来张先免老人不幸去世的消息。张先免老人是山西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诉讼的 16 位老人中最后一位离世。记者、爱心市民在宝山图书馆展览大厅向张先免老人遗像前献上一束束白色菊花，深表哀思之情。

我们非常痛心、我们久久哀思！

我知道，随着时间流逝，这些老人终将离去，但历史早已定格。定格的历史不容歪曲，更不容否定！

中国境内最后 24 位 “慰安妇”调查

2014 年 6 月 12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受理中方提交的南京大屠杀和日军强征“慰安妇”历史档案申报“世界记忆名录”，批复时间将是明年——二战胜利 70 周年。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违反人道、违反人类两性伦理、违反战争法规的制度化的国家犯罪。此次提交的“慰安妇”历史档案主要包括驻扎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侵华日军关东宪兵队档案、华中宪兵队档案、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档案、汪伪政权档案、“满洲中央银行”档案以及日本战犯的笔供等。据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的研究，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制度的受害者，中国籍女性约 20 万人。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说，由于战乱、疾病和固有文化观念造成的舆论压力，我国境内愿接受访谈的幸存受害者只有 120 多人。时至今日，中国境内仅剩下 24 位幸存者——山西 10 人，海南 9 人，广西 2 人，湖北 2 人，黑龙江 1 人。

近日，本报记者前往晋琼桂三地，实地探访这些受害者的生存境况，

并对多位长期关注这一问题的中日两国学者、民间人士进行采访，以期从更深层次上呈现这段历史的现实意义。

不屈的抗争，风雨索赔 19 载

“没有告赢日本吗？请你们再核实一下好吗？”靠床而坐的黄有良吃力地向前探了探身子，焦急地对村干部说。

在一旁的儿子胡亚前，叹息着摇了摇头。他说，早在 2006 年 8 月 30 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原告败诉时，母亲就知道了她作为海南“慰安妇”幸存者起诉日本政府的结果，“整整一天，她没有讲一句话，也没有吃一口饭”。

对于悲惨过往，现年 87 岁的黄有良记得很多细节，却似乎刻意在忘记一些重要的事。在海南省陵水县这个相对闭塞的黎族村寨，黄有良很期待外人来探望她，特别是陪她去日本打过官司的律师和学者，企盼

听到那个她想要的结果。

“日本人干吗不承认？当年他们那么恶霸……”黄有良抬起枯枝一般的手，蒙住了双眼。

不断被驳回也要再上诉

海南受害者起诉案与之前的3次山西“慰安妇”幸存者诉日案件一样，在反复上诉与驳回之间挣扎，最后均以原告方败诉告终。

黄有良的对日诉讼之路，长达十年。

包括她在内的8名海南“慰安妇”制度受害者起诉日本政府，是截至目前最后一场中国境内“慰安妇”幸存者的对日诉讼。

2001年7月16日，黄有良等8名原告（2名已过世原告由遗属出庭）提起诉讼，被告是日本国，要求判令日本政府在中日两国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并赔偿每位原告2300万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152.6万人民币）。这些幸存者大都是海南的黎族或苗族，在1939年2月10日日军登陆海南岛起长达6年的统治中被强征和掳掠。她们遭受日军性暴力时都是未婚少女，年龄最小的仅14岁，最年长的才17岁。

一审期间，黄有良、陈亚扁等受害者均以原告代表身份赴日出庭作证，不幸的是，当时又有3名原告过世。2006年8月30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原告败诉。法院认定了当年的侵害事实，但以“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为由宣布原告败诉。

2008年12月，海南受害者再度出席东京高等法院开庭并作证。2009年3月26日下午，日本东京高等法院就中国海南岛“慰安妇”诉讼作出二审判决，驳回原告方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的诉求。原告陈亚扁老人等再度提出上诉。

2010年3月2日，日本最高法院第3小法庭决定驳回原告上诉，维持一、二审判决。至此，海南受害者起诉案与之前的3次山西“慰安妇”幸存者诉日案件一样，在反复上诉与驳回之间挣扎，最后均以原告方败诉告终。

“怎么会没告倒日本呢？”黄有良蹙着眉，喃喃自语般反复道。

研究“慰安妇”问题22年的苏智良教授认为，日本各级法院判决各国“慰安妇”受害者败诉的根本原因，是日本不能正视和反省自己所犯的战争罪行。迄今为止，所有在日本法院的“慰安妇”诉讼均以败诉而告终。其理由无非是“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即“国家无答责”，或者是索偿超过已20年诉讼期，以及赔偿问题在邦交正常化时已解决等。但这些理由并没有可信的法理依据，因为根据目前国际社会普遍认知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报告，均认定“慰安妇”是二战时期违反人道、侵犯人权和妇女权益的反人类罪。根据《海牙公约》、《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法原则及二战后有关国家（如德国）相关案例，反人类罪等战争罪不适用时效问题。日本宪法第98条第2款也规定：“日本国缔结的条约以及被确立的国际法规则必须诚实地遵守。”因此，日本国内法庭审理因战争行为引起的诉讼时，完全可以直接援引国际法。

“中国政府放弃了对日的国家赔偿，但并没有放弃民间赔偿。”1995年3月，时任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说。在这句话发表5个月后，“慰安妇”制度的中国受害者走上了艰难的对日民间维权之路……

她们不是军妓而是性奴

中国受害者是在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背景下，被抓捕关押的性

奴隶，不像军妓那样有钱款收入，而是被残酷虐待、生不如死。

李秀梅，最早出现在日本法庭上的“慰安妇”受害者。

1994年10月22日，李秀梅在女儿的陪同下来到北京，与准备帮助中国女性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的日本律师团律师大森典子、简招友了见面。大森典子记得，李秀梅是第一个写下诉状的受害者。

1995年，李秀梅成了第一批中国“慰安妇”对日索赔诉讼团成员。

令人痛惜的是，今年4月10日，87岁的李秀梅在家乡含恨去世。至此，第一批诉讼团的所有起诉受害者均已离世。

“在日本法庭上，李秀梅老人铿锵有力的话语，仍浮现在我们眼前……我们失去了一个与日斗争的战士。”大森典子发来唁电。

李秀梅1928年生于山西孟县西潘乡李庄村。1942年的一个秋天，日军打到了李庄村，李秀梅一家和乡亲们躲进了山里。到了下午，人们误以为日本鬼子回据点了，便纷纷回了家。谁料想，李秀梅全家遭遇杀了个回马枪的鬼子。父亲被鬼子的刺刀逼着，母亲被打晕在地，李秀梅则被强行掠走。不久，母亲因悲愤绝望上吊自尽，父亲精神失常。到了日军据点，李秀梅当晚就被几个日本兵轮奸。在以后的5个月里，她受尽凌辱。一次因为她反抗日兵，遭到毒打，直到一只眼睛被皮带打瞎、大腿骨被踢断，奄奄一息。哥哥接到同村的伪军通知，用箩筐把她抬回家悉心照料。李秀梅活了下来，但因为这段性虐，数十年来她都生活在屈辱之中。

1992年7月，张双兵的出现改变了她最后的人生轨迹。那时，张双兵已经做了10余年山西省“慰安妇”幸存者口述史的收集工作。“她一见到我，就把这些经历原原本本讲了出来。”张双兵说，他当时大为感动，“这么多年的屈辱，把大娘压抑太久了。”2000年8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携夫人陈丽菲探望李秀梅，她把自己经

历的一切都告诉了她们，形成了3000多字的“口述历史”材料。

1995年8月7日，中国抗日战争女性受害者对日索赔诉讼团李秀梅、刘面换、陈林桃、周喜香等4名孟县受害女性，在日本辩护律师团和日本市民民间友好团体帮助下，第一次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道歉、谢罪和赔偿每人2000万日元（按当时汇率约合196万人民币）。之后的1996年和1998年，山西“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又分两批12人，向日本政府提起同样的诉讼请求。

1996年7月，李秀梅与刘面换老人来到东京，这是中国“慰安妇”受害者第一次“人证到庭”。在东京地方法院法庭，当庭审法官问及李秀梅母亲的情况时，家破人亡的悲剧让李秀梅当场痛哭，久久难以平复。

“那时，我们根本不知道老人们有这样严重的后遗症。”大森典子说，“看到李大娘哭，我们才感受到留在她们心底的创伤有多严重，知道当年日本兵对那些少女的暴行有多残酷。”事实上，当时对中国“慰安妇”的真相很多人并不了解，甚至一度被误传为“军妓”。曾为多名日军“慰安妇”幸存者做口述实录的陈丽菲说，在日语里，“慰安妇”等同于“军妓”。在日本，确实有相当一部分女性是自愿为自己的同胞兄弟服务，她们是“慰安妇”。但中国的受害者是在日军实施“慰安妇”制度背景下，被抓捕关押的性奴隶，她们不像军妓那样有钱款收入，而是被残酷虐待、生不如死。“直接称她们为‘慰安妇’是对这些老人的侮辱，没有一个中国受害者是去‘慰安’日本鬼子的。”

2000年12月5日，李秀梅再次来到东京地方法院出庭出证。2001年5月30日、2004年12月5日，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和东京高等法院以“国家无答责”和“诉讼时效已过”为由，两次驳回山西孟县李秀梅“慰安妇”受害者的第一批诉讼请求。2007年3月27日，日本

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驳回李秀梅等 4 人的诉讼请求。

尽管在日本政府的强烈干预下，李秀梅等中国受害者提起的对日诉讼全部败诉，但二战时期日军曾严密掩盖的这项反人类罪行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所了解。“正因为有那么多和你一样勇敢的女性站出来揭露日本军队的残酷暴行，才让我们了解到那一段真实的历史……想想你们含恨离开这个世界，我深感内疚……我发誓一定倾尽全力，让日本政府以实际行动真诚面对历史，向所有受害者谢罪，不让这样的历史重演。”在大森典子致李秀梅的信电中，她这样写道。

今年 4 月 18 日中午 12 点，李秀梅老人出殡的时辰到了。鞭炮齐鸣，挽幛飘舞。大娘的后辈手捧老人遗像，走在 200 多米长的送葬队伍最前面，8 个亲友抬起老人的薄棺走在最后。队伍穿过小镇，在荒野中，老人的棺木缓缓下葬。傍晚，天色突变，大雨如注。

“就算现在那些当年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的日本人已经去世了，也要将官司一直打下去，让日本政府正式道歉与赔偿。”离世一个月前，李秀梅对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研究生赵文杰说。

“丑啊”也要说出苦难

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林伯耀认为，“中国人如果不说，那没有受到过全面历史教育的日本年轻人，要怎么才能知道这段历史？”

这个承载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沉重伤痛的受害者群体，因为惨遭日军性虐待，不仅落下一身重病，甚至不成人形，而且饱受乡间舆论的歧视，她们的真名一度被“进过炮楼的女人”替代。

张双兵说，当他辗转找到这些幸存者，开导她们说出过往身份时，常常是在一场沉默之后，听到两个字——“丑啊！”

“我们的观念还是太落后。”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林伯耀认为，“中国人如果不说，那没有受到过全面历史教育的日本年轻人，要怎么才能知道这段历史？”

今年 77 岁的日本一桥大学名誉教授田中宏说，在日本，至今还有很多人不清楚侵华战争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的历史教育问题很大”。在他看来，日本实际进入侵略战争状态的时间可以追溯到 1894 年中日甲午海战，但在 1945 年，田中宏上小学三年级时，教科书中涉及战争的部分，只写了 1940 年日军因“南进”与在东南亚设有属地的英美等国发生冲突，以及 1941 年日军偷袭珍珠港，对美国宣战，“就好像日本打仗的对手一直只有美军英军，而且几乎没有提及日军多年来对亚洲人民的伤害”。这致使有些日本人坚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时长只有 5 年——从 1941 年与英美发生冲突，至 1945 年无条件投降为止。田中宏认为，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1931 年日军“原创”的“慰安妇”制度、1937 年 12 月 13 日开始的“南京大屠杀”等等历史真相，在日本右翼大放厥词的遮掩和否认之下，会有不少日本民众相信这是“莫须有”。

长期旅居日本的中国电视人朱弘说，日本教科书中对于这段战时历史的描述，特别是侵华战争等发生在亚洲战场的记录，常在左翼与右翼的“攻守之间”。他打了个比方，如果说在战时及战后一段时间内，提及日本在亚洲罪行的内容“只有二三秒的长度”，那么经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左翼的努力，将这部分内容“延长到了十秒”，而从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右翼再度猖獗开始，内容又被删减和篡改，“现在保留最多的可能有五六秒，极端的又回到二三秒”。朱弘介绍说，日本的教科书版本较多，某个学区内的学校最终选用哪本教科书，是由当地的教育委员会指定的，“如果委员会中，右翼的势力比较强，那就选择涉及内容

少的教科书。”

“我念书的时候，教科书上就写了‘日本战士在亚洲战场做了一些不太好的事，强奸妇女，设置慰安所关押妇女’，内容非常少，现在都删了。”生于1984年的日本女孩米田麻衣说，“日本的80后多少还知道点这段历史，90后、00后基本都不太了解了。”

本月初，第12届“日军‘慰安妇’问题亚洲团结会议”在日本东京举行。日军“慰安妇”问题研究权威学者、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在会上表示，日本政府早在1991年12月开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军相关的“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后，于1993年8月4日由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宣布调查结果时发表谈话：承认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在很多地方设置了慰安所，在那里有很多“慰安妇”；慰安所是那时的军事当局要求筹建的，原日本军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置、管理以及“慰安妇”的运送；“慰安妇”的招募，主要是由军方委托进行的，但也有经过花言巧语和高压而违反本人意愿的许多事例，也有一些是官吏直接支持的。但今年2月，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多次表示，将对“河野谈话”进行验证，调查谈话所依据的日军“慰安妇”受害者的证词内容。吉见义明展示了近年在海内外新发现的日军“慰安妇”资料，并表示将把其中529个文档提交给安倍政府，“这些新发现的档案才是日本政府应该着手调查和验证的材料”。

本届“日军‘慰安妇’问题亚洲团结会议”主办方工作人员、曾多次走访过山西“慰安妇”幸存者的川见一仁对本报记者说：“日本国内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还要纠缠这些多年前的事呢？我告诉他们，因为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真正的中日友好是很难实现的。”

《文汇报》记者 单颖文
2014年6月18日

让我们永远记住我们民族的苦难
记住这些苦命的老人
不忘民族的苦难
是为了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陈亚扁

(1927-2017) 黎族 海南陵水本号镇人

1942年，陈亚扁15岁时被逼为日本人的性奴隶。三年中，她辗转于三亚市海棠湾镇（原藤桥镇）与陵水县本号镇（原祖关镇）砧板营两地军营慰安所。常年被日本兵强暴，经常遭受毒打，眼睛都哭坏了。

“不公平呀！日本既然承认了日本兵以前做的坏事，为什么还是不道歉、不赔偿？”2006年9月，陈亚扁远赴日本聆听判决结果后，十分气愤。“官司输了，我不甘心。只要我没死，我就要继续讨回公道！否则我死了都闭不上眼睛。”2014年5月，躺在病床上的老人身体非常虚弱。

海南“慰安妇”幸存者陈亚扁

陈亚扁的手温热，无力。

她正躺在海南省保亭县本号镇卫生院的病床上输液。最近，因为气管炎发作，87岁的她隔天就得吊一上午的盐水。

又是一阵剧烈的咳嗽，陈亚扁痛苦地闭着双眼，一只手卡在喉咙上，喘着粗气，好一会儿才平复下来。“下次来，你们就见不到我了。”她断断续续地说。

这是2014年5月18日，记者在镇卫生院的病床上见到陈亚扁老人的情景。外孙女陪着她。老人纤细、布满皱纹的手臂上扎着针管，血管清晰可见。几乎天天扎针，两只手臂都布满了针眼。老人太虚弱了！

一个女护士站在一旁，无助地看着老人。

镇敬老院就在卫生院的后面。200多米的距离老人竟走了20分钟。输完液，外孙女搀扶老人回家。烈日当空，老人戴着一顶草帽，拄着拐杖艰难地行走。同行的记者小单一起上前搀扶。

自2012年底，老人搬进了镇敬老院。一间大约15平米的房间便成了老人的新家。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还有就是自己烧饭的炊具。桌上堆满了药品，十分凌乱。

老人进屋就瘫倒在床上，痛苦万状。

记者向孙女了解老人的状况，拿出慰问金安慰老人，老人紧紧地抓住记者小单的手，久久不放。“下次来，你们就见不到我了！”老人再次无力地述说着。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令人凄楚。

老人再也无法叙说经历的痛苦和屈辱，她努力睁开眼睛，目光露出的是不平和愤恨。70多年前遭受的苦难，深深地折磨着老人身心。

“官司输了，我不甘心。只要我没死，我就要继续讨回公道！如果我死了都闭不上眼睛。”老人低声说着，孙女一字一句地翻译着。

以下是“慰安妇”调查员李晓方多年前采访整理的老人的自述：



